

曹魏文化与《三国演义》研究

CAOWEIWENHUA YUSANGUOYANYIJIANJIU

王海升 张兰花 主编

曹魏文化与《三国演义》研究

CAOWEIWENHUA YU SANGUOYANYIYANJIU

王海升 张兰花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魏文化与《三国演义》研究/王海升, 张兰花主编.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215-07017-2

I. 曹… II. ①王…②张… III. 《三国演义》研究
IV. 1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7444 号

曹魏文化与《三国演义》研究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裕焜 刘世德 陈 辽 林家骊 杨建文 胡世厚 董家平

编委会

主任: 陈铁山

副主任: 杨星钊

委员: 王海升 张兰花 解淑云 任灵华 黄青喜 石振平
魏玉龙 封景彦 马 刚 崔章炳

主 编: 王海升 张兰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中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32.5

字数 55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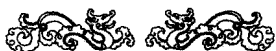
张玉欣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文化艺术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是诸子百家思想空前活跃，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第二次文化艺术的繁荣发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唐宋时期，主要表现是该时期的文学、雕塑、书法绘画、茶道、祈祷建筑、服饰艺术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主要代表是建安文学的出现，而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曹操父子与建安七子。

曹操对历史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陈寿在《三国志》中非常肯定地说：“（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曹操“好文而能善政者”。他戎马一生，歌赋相随，抒烈士之怀，咏英雄之志。文人墨客集于身边，高贤志士聚于幕下，可见其才华和魅力；好研兵法，计谋万端，建安风骨，刚健沉雄，可彰曹公历史之地位。曹操是当时政治之领袖、文化之领袖、军事之统帅。因此，他融入历史，历史就显得波澜壮阔；他走进文学，文学就呈现出灿烂辉煌；他步入百姓，人群就会沸腾不息，这就是曹操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定都许昌，使许昌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建安文学的发祥地。他开创的建安风骨在魏晋南北朝一脉相承，自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艺术繁荣时期。可以这样认为，曹魏文化始许昌，许昌不仅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而且是中国第二次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主要发端地。

这部论文集之所以使用“曹魏文化研究”一词，是因为我们界定的曹魏文化主要是指以曹操为建立曹魏政权而征战四方、平定天下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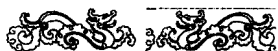


曹魏政权覆亡止的时期内,曹魏集团所创造的多方面的精神文化而言。这里亦包括了《三国演义》中对曹氏集团的描述。我们认为,曹魏文化是三国文化的主干,是建安风骨的脊梁。罗克基说过:“一切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史。”曹魏文化的创新性、开拓性,与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它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研究、思索和借鉴。

为承袭曹魏文化精神,使其在当今时代赋予更新更大的现实意义,许昌职业技术学院2006年成立了曹魏文化研究所,组织学术力量对曹魏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曹魏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得到了国内学术机构、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三国专家、学者们共聚一堂,不仅对曹魏文化投之以关注的目光,还立足于社会实际,从不同的文化视角进行挖掘整理、分析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有一些新的发现和启示,这些无疑对三国学术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使这些研究成果更广泛地得到交流讨论,现将会议研讨文章编辑出版,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拓宽三国文化学术视野,丰富学术研究成果,进而对现代企业的管理和地域文化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参阅和借鉴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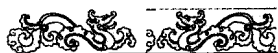
(作者系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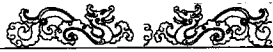
目 录

曹魏文化研究

东汉末年的曹操·····	傅 刚	2
魏晋玄学“才性异同”向“无累于情”的过渡·····	宁稼雨	14
阮籍及其诗文创作·····	林家骊	35
曹丕《杂诗》其二的疑义、真伪和唐人旧说·····	胡耀震	53
阮籍的玄学“气本论”及其思想价值·····	韩国良	65
建安文风的儒学意蕴及其成因·····	孙 宝	77
三国时期为何“文在曹魏”·····	杨建文	88
论《行行重行行》与《青青陵上柏》的写作背景·····	木 斋	96
《华佗五禽戏》开创了我国医疗体育运动之先河·····	史友仁	118
呼唤许昌曹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崛起·····	张兰花	122
论两晋时期的曹操评价·····	马宝记	132
论三国时期早慧儿童之教育·····	王海升	157
曹睿对魏文学的贡献·····	魏宏灿	166
曹操“都许”的战略眼光与战略意义·····	王前程	175
许国的世系及五次迁徙论考·····	金荣权	180
三国两晋时期颍川地区的佛教·····	陈艳玲	190
汉晋之际颍川荀氏家族文化研究·····	石振平	199
何晏《景福殿赋》中对用人机制的思考·····	樊 荣	209
转型时期的君子人格·····	陈春霞 林家骊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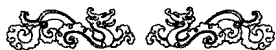


论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体观及其对文体学著作的导向意义	吕红光	林家骊	228
论屈原《离骚》和曹植《洛神赋》中宓妃形象	吴美卿	刘怡菲	236
从阮籍五言《咏怀诗》看其思想的儒道相融	刘英		247
曹植居陈略论	李治中		255
孙策“阴欲袭许”刍议	朱健文		261
“死后欺人设疑冢”	郭胜强		271
王粲文学论	黄燕平	林家骊	276
《三国演义》研究			
《三国志演义》周日校刊本插增关索考	刘世德		288
以史衡文:《三国演义》的误读	周先慎		306
《三国演义》对封建王朝败亡规律的揭示	陈辽		312
为罗贯中一辨	马成生		319
《三国演义》蜀汉与曹魏人才问题比较谈	关四平		328
《三国演义》的创作模式及其“范型”意义	雷勇		343
《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周文业		352
《三国志》裴松之注与《三国演义》人物塑造	刘永良		366
《三国演义》与《三十六计》的关系及其他	宋培宪		387
平话与演义结构之比较	李继华		397
罗贯中的“崇刘抑孙”浅谈	王益庸		405
浅论《三国演义》中的诗歌	杨小平		412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及其三大“敌人”	石麟		420
两都:《三国演义》叙事的空间铰链	周晓琳		432
论《三国演义》中东吴集团的“崇少”现象	韩晓		439
《三国演义》对陈宫有关史料的加工	王建新		447
毛宗岗小考两则	李正学		453
杜甫与三国文化	魏景波		460
诸葛亮与“科技兴国”	李德书		469
女性的失语	孙艳红	张丽红	475
《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军事指挥艺术	夏旻	罗珊	484



从《三国演义》看养身之道	曾 良	492
论《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	张振萍	499
对镇江铁瓮城保护的思考	王玉国 刘建霞	505

曹魏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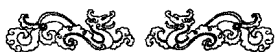
东汉末年的曹操

傅 刚

本文想从选择与被选择的角度说明东汉末年在曹操的时代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政治、制度、道德,以至于学术文化,这都与曹操发布的政策、措施有关,这是曹操在当时历史条件中选择的结果,但是,曹操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吗?我以为曹操还有一个被选择的问题,即东汉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要研究这个历史条件。

一、东汉末年的曹操

晋傅玄曾经说过:“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傅玄是礼法之士,政治上又是拥戴司马氏的,这样说是批评曹操、曹丕给魏晋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世重玄虚,都与曹氏父子有关。所以傅玄又说:“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傅玄的态度是批评的,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关,但他说的是一个事实。曹操以法术治国,《魏志·武帝纪评》说曹操“攀(揽也)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卷十六《杜畿附子恕传》载杜恕上疏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兢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这都是曹操尚法术的证明。这表明当曹操之时,天下大乱,儒家之学难以收束人心,欲求大治,唯有用法术,这样就对东汉以来的名教之治从根本上进行了冲击。儒学之迂腐,有识之士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比如《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载宋泉谓盖勋说:“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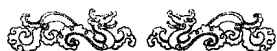
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臬不从，遂奏行之。果被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征。”又同书卷八十一《独行传》载向栩欲用《孝经》灭黄巾：“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在用人上，曹操更与东汉的察举不同，他前后几次下求贤令，都贯彻着任人育才的主张，而不拘于道德之论。如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①这样的用人政策，是汉人不可想象的，它当然会对当时的社会风俗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反映了当时的名教危机和道德危机。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曹操的独创，实在是当时社会的总趋势。

汉末自党锢以来，皇权腐败已极，不只是士人对皇权失望，即使朝中大臣也已经失望，士人失望的结果是不与这个政权同心，因此逸遁以求避祸，而大臣失望的结果，则是逐渐产生了异心，这两者都导致了名教的危机。两汉以孝治天下，以名教为纲，但到了汉末却会出现那么多与朝廷离心背德之人，这已不仅是以曹操为汉贼的问题了。简要说来：

1. 《通鉴》卷五十九载，灵帝中平五年（188），太常江夏刘焉见王室多故，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按，刘焉此议实萌异心，盖借牧伯之重，以为己资。《通鉴》又载，焉内欲求交祉牧，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乃更求益州。会益州刺史郗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耿鄙、张懿皆为盗所杀，朝廷遂从焉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2. 《三国志·魏志》卷十《贾诩传》注引《九州春秋》载中平元年（184），车骑将军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闰忠时罢信都令，劝皇甫嵩不要北面以事庸主，待时机成熟，“功业已就，天下已顺，乃燎于上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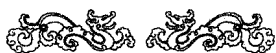


帝，告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于己家，推亡汉以定祚”。

3.《三国志·魏志》卷十一《张范传》载袁术谓张承说：“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用之。孤今以土地之广，士民之重，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按，汉末乘时之士如袁绍，视其时如春秋，如秦末，欲行齐桓、晋文及高祖之事，不臣之心，昭然于天下，故汉献帝如丧家之犬，而诸侯并皆不顾也。陈登原《国史旧闻》引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十六）说：“抄本《穆伯长集》三卷，即四库本。高宗纯皇帝，谓其称颂当涂功德，悖理丧教，屏而不录。其实，汉季群雄并起，非有魏武，早移炎祚，不可与前莽后懿相提并论。”《张范传》又载：是时，太祖将征冀州，（袁）术复问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可谓不量力矣！子以为如何？”承乃曰：“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百万之众可也。”天命未改，是当时一部分忠汉之士的心理，故曹操挟天子，还可以为他们所接受。而一旦曹操欲行九锡，若荀彧诸人就不能接受了。

4.《三国志·魏志》卷六《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载沮授劝袁绍迎大驾于邺城，但郭图、淳于琼则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又，同书《武帝纪》载：“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

以上四例说明汉末忠于汉室的名节观念已经受到很大的破坏，不独曹操，也不独掌握兵权者，一般士人也看准了汉朝天命已尽，将有新命兴起，但这承新命者是何人，也是士人南北奔走选择的主要动因。应该说曹操的出身给他的霸业带来许多不利，他不像袁绍，出生于四世三公之家，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确是一呼百应。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这在宦官作恶多端的东汉末年，的确是非常不好的背景。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司马彪《续汉书》说，曹腾“顺帝即位，为小黄门，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贤达能，终无所伤。”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因将曹腾收入“宦官亦有贤者”条。但据《后汉书·李固传》载，桓帝鸩杀质帝后，李固等议立清河王蒜，梁冀为固其宠，欲立蠡吾侯志，因为刘志当取梁冀妹。梁冀之谋遭到李固等人反对而作罢。但曹腾等闻而夜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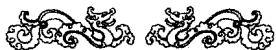


冀处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遂言蠡吾侯，是为桓帝。由此可见曹腾也并不是什么贤者。但曹操这样的出身，当他与袁绍等人霸天下时，士人却竞相舍袁而奔曹。除了因为曹操的用人不拘一格，而袁绍却猜忌，不容贤于己者等原因外，这中间还有什么内存的原因呢？

当然问题首先出在袁绍自己身上，袁氏兄弟的篡汉野心过早地暴露。袁氏四世三公甚至五公，世代食汉禄，而当汉末天子蒙难之时，他们却想到的代汉，这令许多士人感到失望。《魏志·臧洪传》记洪谓袁绍说：“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欲因际会，希冀非望，多杀忠良以立奸威。”

曹操的用人，是必先贤而后用，所以他前后几次下令求贤，都不以德行为主，虽然如此，这样的政策也只能保证得到一些德行有亏之士而已，事实上不是这样，在建安元年前后，投奔曹操的士人，有许多是有很高德望的儒学之士，如何夔、邴原、王朗、华歆等等，无不受应曹操所辟命，其外在的原因与曹操奉天子有关，而内在的原因则与汉末大乱而萌生的“英雄”崇拜思想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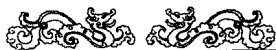
曹操奉天子在建安元年，《武帝本纪》载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赞同。《通鉴》载为荀彧所劝。曹操迎天子都许昌，正如袁绍所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如此，在经历了董卓之乱以后，至是宗庙社稷制度重又建立，这给天下士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士人投奔曹操者络绎不绝。《三国志·魏志》卷十四《刘放传》载放说王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并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乱，翼戴天子，奉辞伐罪，所向必克。”因劝王松投奔曹操。东汉末年，军阀并起，所谓“阻兵擅命，人自封殖”，士人亦南北流寓，虽然对汉王朝失去了信心，但这种王室观念的淡薄与诸侯们拥兵擅命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诸侯都有乘时而起的异心，所以视天子如赘物，但士人仍然寄希望于汉室的复兴，因此当曹操能够西迎天子都许，是符合当时大多数士人的愿望的，这是曹操得人的主要原因。但曹操毕竟是“挟天子”，士人的附曹从根本上说仍然带有几分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仍然要附曹，这又与汉末大乱带来的名教危机有关。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氏代表着寒族阶级的利益，在汉末时，儒家豪族依附曹操，是“不得不暂时隐忍



屈辱,但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①。这一方面说明儒家豪族的依附曹操,只是权宜之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的附曹,首先因为曹操的“挟天子”。虽然是“挟天子”,总还有天子,这也给他们心理上一种自我欺骗的理由。但一旦曹操想要代汉,儒家豪族就要表示反对的意见了。荀彧是曹氏集团中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颍川荀氏,祖父荀淑,当顺、桓之间,知名当世。有子八人,号曰“八龙”。彧叔父荀爽,位至司空。荀彧先是依附袁绍,后度袁绍终不能成大事,于是在初平三年(192)去绍从操(按,此据《通鉴》,《三国志·魏志·荀彧传》作初平二年)。《通鉴》记为:“彧度绍终不能定大业,闻曹操有雄略,乃去绍从操。”此时曹操已破青州黄巾,受降卒三十万,男女百余万口,自领兖州牧,自为士人所看好。荀彧归曹操之后,曹操非常高兴,因为这标志着他的事业成功的开始。荀彧的归顺,表明儒家豪族对他的认可。事实上,曹操最先也正是依靠汝、颖人物。《魏志·郭嘉传》载:“先是时,颖川戏志才,筹划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颖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郭)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荀彧归顺后,为曹操献的最好的计谋就是迎天子,这其实是符合荀彧为代表的儒家豪族的利益的。曹操迎天子后,天下的重心就移到了曹操的身上,他成为天下士人关注的焦点,加上荀彧的加入,一批出身儒族士人纷纷加盟曹氏集团,成为曹操战胜袁氏,最终平定北方的基本保证。

士人之争相附曹,除了曹操的“挟天子”以外,还有其内在的原因,即当时崛起的“英雄”崇拜意识。所谓“英雄”,东汉时有一般意义用语,也有特别的用语。前者如《后汉书·循吏传》载仇览入太学,符融对他说:“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常,守之何益?”又如《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载袁绍说何进曰:“某部曲将吏,皆英雄名士,乐尽死力。”《三国志·魏志·钟繇华歆王朗传》:“繇说(李)傕、(郭)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袁州乃心王室。”可见这些用语都是指乘时所起之各路诸侯,甚或指一般的文人、谋士,如符融所说。又如《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注引《傅子》说:傅巽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庞统则为谋士。但到后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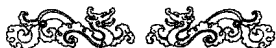
^①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2页。



英雄则有特指的意义,如《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载许劭评曹操为“乱世之英雄”(按《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记许劭评曹操为“乱世之奸雄”),而曹操甚为高兴,这里的“英雄”就有比较高的含义了。曹操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在汉末有许多流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载桥玄见曹操而异之,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桥玄预见到了乱世即至,而且预见到了曹操能够有所作为,这是善知人者,在当时也是具有“英雄”的品目的。汉末“英雄”一词具有特殊含义的,还见于以下记载。《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载:“袁术欲经徐州北就袁绍,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术。未至,术病死。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曹操此处所说的“英雄”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用语,所以刘备才惊慌得失去匕箸。盖以为所怀心事为曹操所道破之故。目刘备为英雄者,荀彧已论在先,《三国志·魏志·郭嘉传》注引《魏书》曰:“刘备来奔,以为豫州。彧谓太祖曰: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此皆可见“英雄”一词,在当时已指争夺天下者之谓。“英雄”意识的崛起,完全是汉末大乱所引起的,能在乱世中苟活性命,是要依靠乱世之英雄的,前引桥玄托家人于曹操,正是看到了曹操是乱世英雄。看到这一点的,似乎并不仅是桥玄,《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附子瓚传》载:“初,曹操微时,瓚异其才,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能在曹操微时就看出他比袁绍等人更具治世之才,这也确是不平凡的识见。又《后汉书·党锢传·何颙传》记颙初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①

“英雄”意识与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是不相融合的,但乱世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伦理观,曹操之所以要用法术,他的用人之所以公开宣扬用无德之人,其实并不是曹操个人的孤见发明,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汉末自桓、灵以来,儒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正在悄悄地式微,

^① 关于东汉末年“英雄”意识的崛起,参见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一种新的适应乱世的思想正在萌芽。曹操适时地成为这种新思想的代表者,他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汉魏间新的学术思想,魏晋玄学之所以能发生,是离不开曹操所营造的条件,也离不开汉末的具体历史条件的。东汉末年所谓乱世,造就了曹操这样的英雄,而曹操又以自己的风格和个性给东汉末年带来了新的变化。

二、曹操的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是属于曹操的,汉末大乱,为曹操创造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曹操都对汉家制度作了大面积的破坏。他的破坏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表现是他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名教的冲击,如前文所说,他用申、韩法家之术,重实用,以法治国,在用人上也是唯才是举,不论出身、道德,对汉代以来的察举用人的思想依据,不予考虑。这些当然是时势使然。事实上,综观汉末三国的形势,不独曹操尚法家思想,蜀的诸葛亮也是典型的法家,史称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①。吴孙权也是如此,《三国志》本传评曰:“孙权屈身,任和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吴、蜀偏于一隅,应付魏国已尽全力,更无余力修文。三国时文学之事只有曹魏兴盛。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文人大都已跑到了曹魏,事实上吴、蜀也都有不少的文人,如吴的张昭,本彭城人,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群书,与琅琊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孙策创业之江东,文武之事,一以委昭,而昭与北方士大夫常通书疏,曹丕作《典论》专门纸写一通寄与张昭。张昭之外又如:

张敦:“吴郡人。敦德量渊懿,清虚淡泊,又善文辞,与陆逊、卜静、顾劭等皆亚焉。”^②

张紘:广陵人。孙策创业,遂委质焉。建安四年,奉孙策命到许官,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与之亲善,后紘见栲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紘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建安十七年卒,著诗、赋、铭、诔十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30页。

^② 《三国志·吴志·顾劭传》注引《吴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29页。



余篇。^①

其他如薛综、薛莹、鲁肃、陆景、胡综等约十余人。蜀汉人物差一些,但也有郤正、文立等人。由上可见吴、蜀文人并不缺少,但是因为主上不好,又没有一定的创作环境,所以没有多少作品传世^②。与吴、蜀不同,曹魏的文学兴盛,并没有因为曹操的奉行法家思想而衰弱,反而由于曹操的喜爱而得到大的发展。这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提倡对于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从东汉末年历史看,法家思想的抬头,其实并不仅仅是曹操的原因,比如崔寔的《政论》就说:“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已经说明汉末正在酝酿着法家的思想,这从蜀和吴两国也实行的法家政策可以见出。此外,就用人的唯才思想看,其实也仍然不独曹操,刘备、孙权等也都是如此。不如此的如袁绍、袁术,所以他们失败了,最先投奔他们的许多优秀士人,在知道他们不是唯才用人的时候,莫不鄙视他们而转向投奔曹操。但是当曹操将这一切以法令的形式颁布的时候,影响就不一样了。我们说过,曹操用人唯才是举,与他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他要与袁氏兄弟、与公孙瓒、与刘虞等等争夺天下时,他有很大的劣势,所以他要唯才不唯德。但在曹操于建安元年奉迎天子之后,他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一些儒家豪族出身的人也都奔向他,他仍然执行唯才不唯德的政策。他的前后几次下令,都是建安元年以后的事。如著名的建安十五年令称“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建安十九年下《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建安二十二年《求逸才令》曰:“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有所举,勿有所遗。”这样的政令与两汉的名教当然是对立的。当然这与时局有关,曹操自己也说是“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应该是一时的应急之策。但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就会带来后果,待天下大定之后,也不能再回到汉代的察举了。这有几个因素,一是重新收拾的天下已经

① 参见《三国志·吴志·张紘传》及裴注引《吴书》。

② 参见拙作《吴蜀文学不兴的社会原因探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